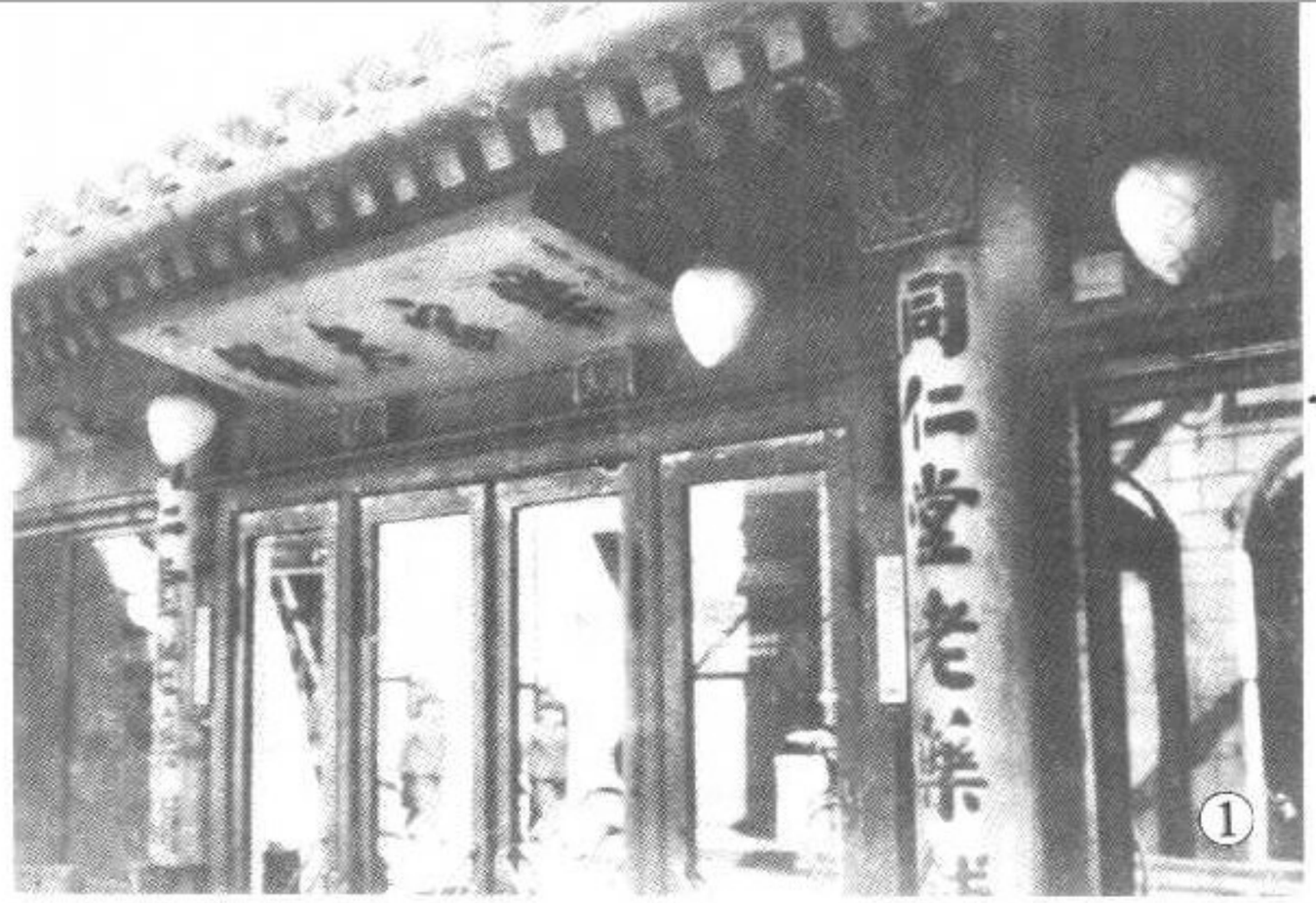
燕都

您想了解老北京的风采吗？请看《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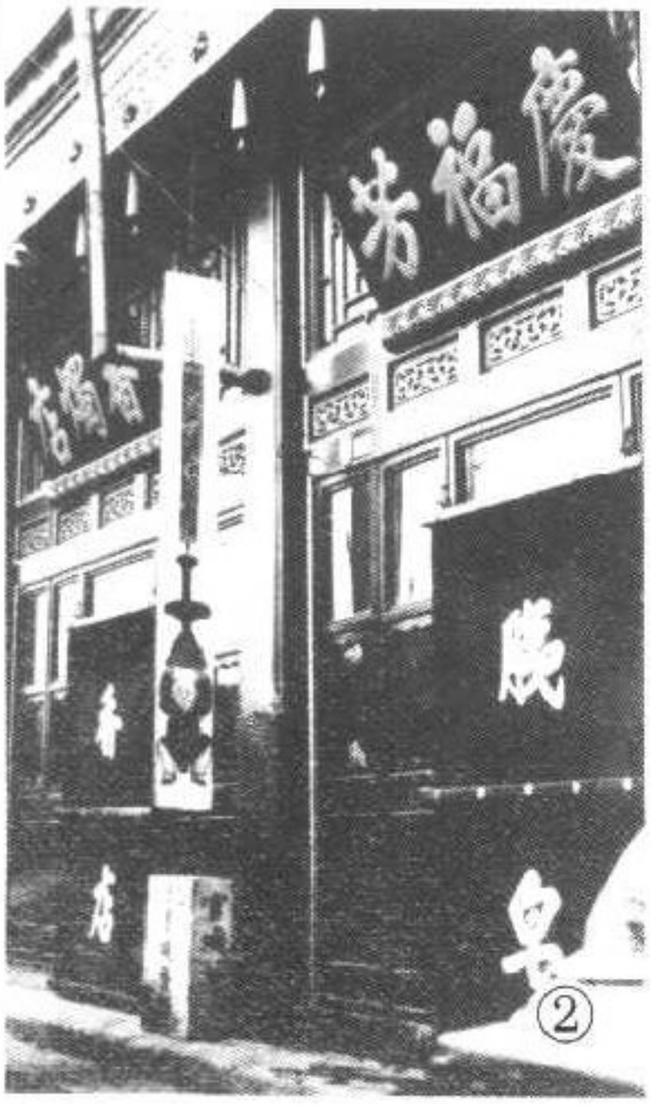
第二期 · 85 · 10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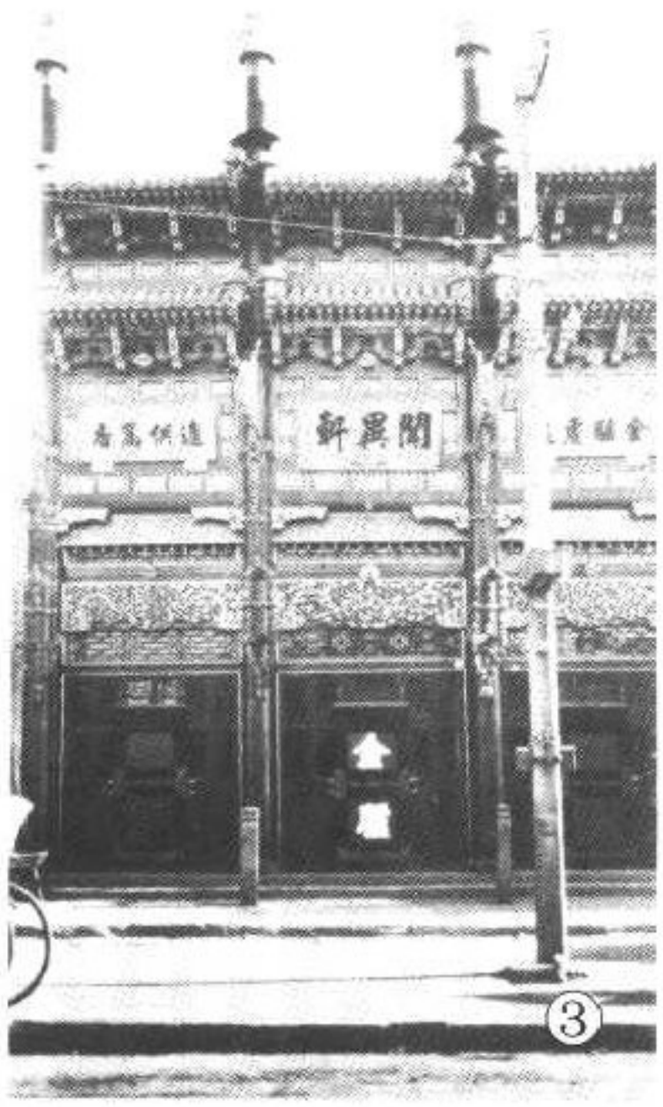
燕都古貌



①



②



③



④



⑤

①大栅栏同仁堂中药铺。
②宣武门外庆福芳。
③地安门外大街闻异轩香烛店。
④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
⑤盛锡福鞋帽店。

China

鹦　鹉　曲①

燕　南②八　景

元·冯　子　振③

卢沟④清绝霜晨住，　　步落月问倚阑父。
蓟门⑤东直下金台⑥，　　仰看楼台飞雨。

道陵⑦前夕照苍茫，　　叠翠望居庸⑧去。
玉泉⑨边一派西山⑩，　　太液⑪畔秋风紧处。

---

①鹦鹉曲：词牌名。

②燕南：宋宣和间，改燕京为燕山府，府在今北京大兴县西南。该府辖今河北省北部和东北部。燕南，指燕山府管辖的南端，即今北京地区。

③冯子振：元散曲家。字海粟，号怪怪道人，又号瀛洲客，攸州（今湖南攸县）人。生于1257年，卒于1314年。曾官集贤待制，有梅花百咏一卷。

④卢沟：亦称浑河，即今永定河，俗称黑水河，河上有桥即卢沟桥。“卢沟晓月”为燕京八景之一。

⑤蓟门：即蓟丘。《战国策》燕策已有蓟丘之名。传说故地在今北京德胜门外，“蓟门烟树”为燕京八景之一。

⑥金台：又称黄金台，相传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故名。“金台夕照”为燕京八景之一。

⑦道陵：金章宗陵，在北京房山县西北大房山。

⑧居庸：即居庸关。在北京昌平县西北，又称军都关。“居庸叠翠”为燕京八景之一。

⑨玉泉：出自北京西北玉泉山下，又称御河，元时为金水河。“玉泉垂虹”为燕京八景之一。

⑩西山：为太行山支脉，又名小清凉山。“西山霁雪”（或“西山晴雪”）为燕京八景之一。

⑪太液：即太液池。元时名西华潭，即今北京北海、中南海。“太液晴波”（或“太液秋风”）为燕京八景之一。太液池岛为琼华岛，“琼岛春阴”（或“琼岛春云”）为燕京八景之一。　　李西克辑注

燕　都

第二期

1985·10

总第（二）期

编　辑：
《燕都》杂志编辑委员会
出　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36号
印　刷：
北京兴红印刷厂
一二㈢二印刷厂
总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
零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
每逢双月出版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096号
定　价：0.45 元

京都民俗
村歌社舞古风存　包世轩　22
金风送爽话中秋　郭子升　25

文物欣赏
「谏鼓谤木」的故事　梅　仙　16
章太炎《徐中山泛舟图》　章津才　17
投　壶　齐　心　19
古灯的联想　闻性真　20

人物丛谈
王瑶卿说玉　余　时　11
刘半农买书　李　余　14
宋庆龄同志光荣伟大的一生　黄　羽　15

文物论坛
《北平风俗类征》序　钟敬文　1
乡土文物和乡土文学　刘绍棠　4
要爱护北京城　张开济　5
鹦鹉曲——燕南八景　李西克辑注　7

封底	长信宫灯	
插四	卢沟晓月畅想图	
插二三	釐延千梵图	
插一	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	
封三	赵廷芳篆刻艺术	
封二	燕都古貌	
封面	天安门之夜	
美术摄影		
46	印第安古代文化遗产的宝库	晓泳供稿
国外见闻		
42	中岳嵩山纪游	东方人
44	海中洲纪行	
祖国胜境		
45	千步廊与「龙门」、「虎门」	故宫藏画
41	话说老北京的吆喝	张大卫供稿
40	漫话象来街	赵廷芳
38	老北京商店的牌、匾、对联	首都博物馆供稿
旧京琐记		
31	药王庙	陆坦
37	赞《卢沟晓月畅想图》	崔友利
34	北京的古树	陈道馥
古迹寻踪		古伟中
32	乾隆皇帝出生在哪里？	史文
28	漫谈明十三陵	穆沐
宫廷轶事		王小平
		李秀兰
		方方
		梁正江
		万依
		贺海
		许大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要爱护北京城

张开济

不少人知道，月球上可以看到的人类工程是长城，却很少有人知道“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可能是北京”。后者是一位美国城市规划权威对北京城的评语。这并非溢美之词。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城，是世界上极少数完全按照非常完善和出色的城市规划而建成的都城之一。她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气势壮观，建筑华美。仅一条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就长达八公里，真不愧为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个空前的杰作。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北京而感到骄傲，同时也有责任保护好北京城原有的风貌。

近几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个发展趋势值得意意：那就是高层建筑越建越多，越建越高，仅计划中要建的五十层高楼就已经有好几幢，长此下去，北京很可能建设成为一个香港式的城市了。不过香港的高楼林立是它人口过多、土地奇少而造成的，使城市畸形发展了。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用地虽然也相当紧张，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香港这样的程度，因此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向香港学习，何况北京又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世界上只有巴黎、伦敦、罗马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城可以和北京相提并论。

我们不妨看看这些城市是怎样对待高层建筑的。

1985年4月14日北京日报登载了一篇该报驻巴黎记者对法国建筑师的访问记，题目是《北京市的城市建设要有“北京味”》，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谈到近年来北京市高层建筑迅速增加时，他们（法国建筑师）殷切期望北京市在建设规划上一定要避免巴黎建设中的‘过失’”。五十年代末，巴黎学纽约，在市西部建起了几十幢摩天大楼，与巴黎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两者显得很不协调，使这个城市失去了和谐的美感。

（下转第6页）

乡土文物和乡土文学

·刘绍棠·

三十六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我一直写的是北京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创作，离不开描写本乡本土的风土人情。而要描写本乡本土的风土人情就不能忽略本乡本土的名胜古迹。如此才能表现出乡土的历史风貌和生活环境，才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我的家乡是北京通县，通县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我的已经发表的六部长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和上百篇短篇小说，每一篇都要写到大运河。大运河和古长城，是我国两个最伟大的古迹。我向广大读者描写这个伟大古迹的风光景色，展现生存在这个伟大古迹上的人民大众的生活图景，刻画大运河的子子孙孙们那各具特色的形象，记录了大运河流域这一方乡土的历史和时代风貌。我的小说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是引以为荣的。

北运河头，通州城内的燃灯佛舍利塔，也是有一千多年历史而闻名全国的古文物。我在中篇小说《渔火》、《蒲剑》中都有描写，并且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烟村四五家》里，记下了关于燃灯佛舍利塔的最新趣话。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曾在燃灯佛舍利塔下的通县模范小学读高小，因而我对这座宝塔怀有深厚的感情。近几年，我曾多次重游旧地，留连塔下，只见宝塔遭到风雨侵蚀，工厂污染和地震损坏，已经老态龙钟，大有摇摇欲倒之势，感慨万千。听说，北京市文物局将对宝塔进行修缮，但愿早日实现这一德政，以使千年古塔旧貌换新颜。

通县另一座常在我的小说中出现的古迹是八里桥，正名叫永通桥。我在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和中篇小说《渔火》、《小荷才露尖尖角》中，从不同角度描写它的风姿。八里桥曾遭到英法联军侵略者的严重破坏，又年久失修，令人目睹心酸。政府拨款维修，却因承包单位的不懂行和缺乏责任感，不但未能整旧如故，反而增加损伤，令人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我还在长篇小说《地火》中描写辽代耶律阿保机的晾鹰台，在长篇小说《京门脸子》中述说辽代萧太后的萧妃井，在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和中篇小说《渔火》中描写明代徐达、常遇春的点将台和明成祖朱棣的驻跸台。这些古迹早已湮没无存，只在一些古籍中有所记载，已经鲜为人知。我的小说将把这些泯灭的古迹传名于今世，不知能否唤起今人群策群力，将旧景重现。

我在小说中写得比较详细，而且又直接出过力的是李卓吾墓。

摄影：张　超

明代大学者李卓吾临终前一年流寓通州，隐居著书；因遭谗陷，被捕入狱，自戕而死，葬于通州北关外。一九五四年因该地修建工厂，当时的通州市人民政府将李卓吾墓迁址立碑于城西北郊。十年动乱中，墓碑被毁坏得残破不堪。我这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冒险前往凭吊遗迹，惨不忍睹，悲忿不平。一九七九年我重返文坛，立即呼吁重修李卓吾墓。一九八二年通县人民政府在风景秀丽的西海子公园为李卓吾新建陵园，由我出面请周扬同志题词，镌刻新碑。如今，新建的李卓吾陵园坐落在荷塘碧水之畔，老先生长眠于花树葱茏之中，生前死后历尽四百余年坎坷，今日当可含笑九泉了。

我还为通县辛亥革命五烈士及共产党人周文彬等烈士的树碑立传奔走数年。并于一九八三年春为烈士纪念碑奠基，一九八四年参加了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两次发表讲话。现在，这座纪念碑高高矗立在他们的母校——通县一中（即清末民初的协和书院，解放前的潞河中学）的校园里，激励和教育后人。我的小说，对周文彬等同志写得很少，对蔡德辰等辛亥革命烈士更不曾写过只言片语，是很惭愧的。

我致力乡土文学的一大心愿，就是要通过艺术手段，形象化地为我的家乡写一部二十世纪编年史。因而，也就痛感对于历史和革命文物的发掘，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时，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对边缘工作或边缘学科缺乏兴趣，于是造成若干空白。比如，文物和文学，应该是近亲近邻，然而却交流极少。现在，文物界创办了《燕都》杂志，希望能够门户开放，引进文学界的人士共同耕耘，互惠互利，一举两得。至于我自己，不但要做一个乡土文学作家，而且要兼作一个乡土文物的研究者。

1985年6月写于北京蝈笼斋

（上接第4页）

198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登载过一篇名为《英伦剪影》的文章，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没有摩天大楼的城市”。下面是这一节的扼要内容：“伦敦是闻名全球的大城市。没有到过伦敦的人也许以为这座世界名城会有不少摩天大楼，其实不然……绝大多数建筑物却只有三四层高，二十层以上的建筑物已不多见，更不用说五六十层的摩天大楼了……英国早就掌握了建筑高层楼房的技术条件，但是为保持伦敦市谐调一致的建筑风格，新建筑物没有向高空发展，而着重改进内部布局和使用设备现代化。”

谈到摩天大楼，人们首先会想到美国，因为美国可以说是摩天大楼的发源地。但是，由于华盛顿当地有任何建筑都不准超出他们国会大厦高度的规定，所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便看不到任何摩天大楼，可是人们依旧认为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是华盛顿，而不是摩天大楼林立的纽约或芝加哥。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总该算是世界上的最现代化的城市罢，可是它们或者把建造高楼看作是失败的教训，或者不提倡盖高楼，或者根本禁止盖高层楼。由此可见，高层建筑并不是现代化城市的必要标志，相反，它们对一些历史文化城市来说却可能是一种“污染”。

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热爱程度是和他们的生活及文化水平成正比的。我深信，随着我国城乡经济改革的开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将迅速提高。不过，我担心的是，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许多文化遗产，特别是我们的北京城，要是由于保护不当而面目全非，那末后人是会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的，并且会抱怨我们这一代人的。

应该爱护与保护北京城！

《北京风俗类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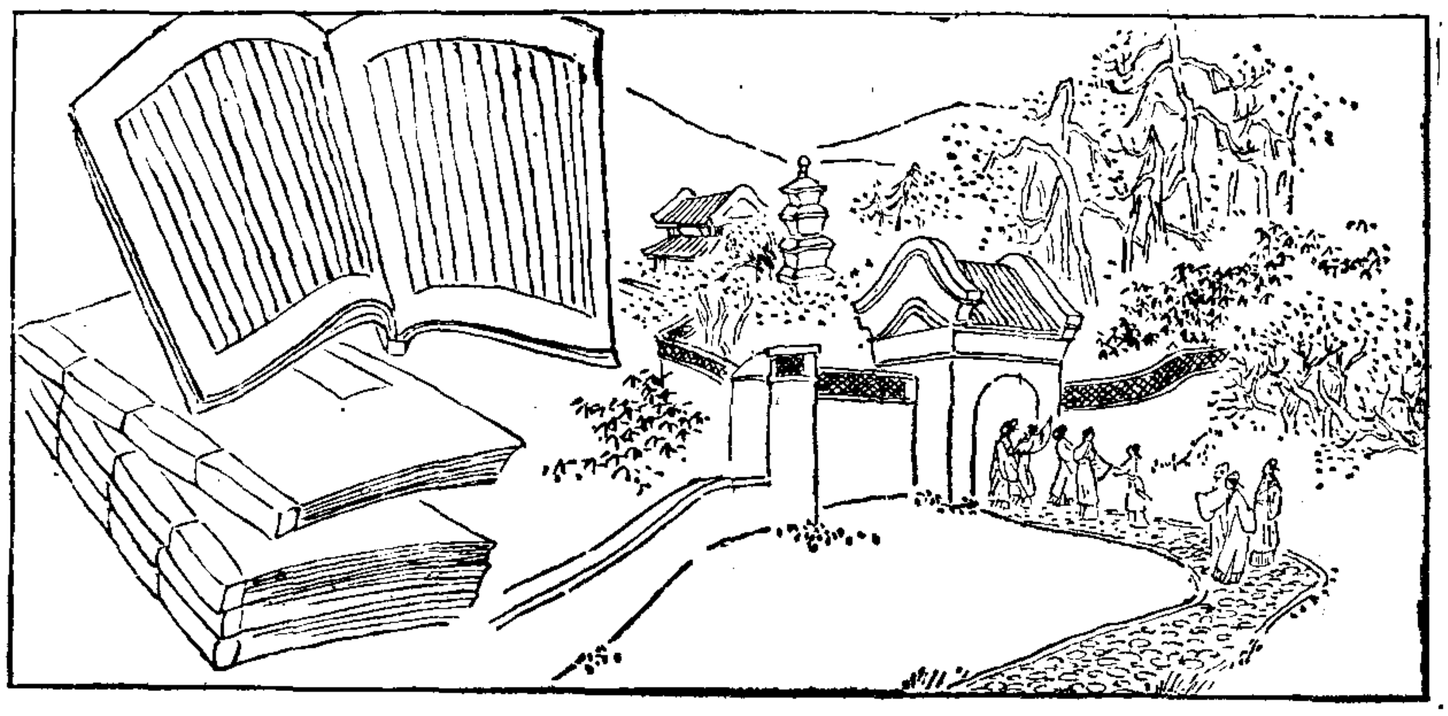
钟敬文

我国古代记述风俗习尚（特别是关于岁时的）的文字，产生相当早，在先秦、两汉的文献里就有了。但是专门记载一地区或全国这方面文化资料的书籍，却似乎到汉、魏之后才涌现。象大家知道的梁代宗懔所著的《荆梦岁时记》，就是显著例子。六朝以后，有隋代的《玉烛宝典》、唐代的《岁华纪丽》及宋代的《岁时广记》等。到了清代，这类著述就更多了。如《杭俗遗风》、《清嘉录》等就是这方面比较流行的书籍。

我国过去记载风俗、习尚的著述，从所记的内容看，约有两类：一类是单纪岁时活动的，如《荆楚岁时记》，就是这一类的始祖。另一类是概括地包含社会风习的多方面情况的，如《杭俗遗风》就是这一类的例子。这两类著述所取材的地域，有的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却是包含许多地区的。后者如二十年代胡朴安编纂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就是例证。

从这类著述的写作方式看，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编者自己写作的，如宗懔等著述，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另一类是类书性质的，即汇辑别人的记录而成的，如《玉烛宝典》等都属这一类。这后一类的形式，是比较多见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民俗学（包括民俗志）、民族学（包括民族志）等的兴起，记录民间风俗、习尚（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文章比过去热闹得多了，编辑成专书出版的也经常出现，如《苏粤的婚丧》、《潮安年节风俗谈》和《中国新年风俗志》等。至于出版的民间歌谣集、民间故事集等，那就枚举不尽了。从我国这门科学发展的历史看，这正是一个近于丰收的季节。



李家瑞先生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1937），可说是在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出现的一种产物，但它又是一部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具有自己的优点的风俗学述作。

首先，我们觉得这部书的取材是相当广泛的。全书分上下两册，共数十万言，所援引的书籍、期刊多至四百余种。把北京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数百年来有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文献资料差不多都网罗在一起了。跟它比较起来，那位清初著名诗人兼学者朱彝尊所主编的《日下旧闻考》有关风俗部分，就显得有些寒碜了（自然这里面包含着辑录时代的先后一类的问题）。明清两代记述北京风俗的专书也不是没有，如《燕京岁时记》等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但它是单记岁时活动的，而且篇幅也很有限。在李家瑞先生这部书里，把北京风俗分为十二类（连卷末“杂缀”计算在内，共十三类），单就第一类“岁时”，就占了一百二十页。所收罗的繁富，可以推见了。

其次，这书丰富的资料中，明显地包含着多民族的传承文化的成分。汉民族本来就是由许多各自独立或半独立地存在着的部落、部族长期融合凝聚而成的。但在他相对地形成后，又与周围的一些部落或民族不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逐渐交融在一起，或暂时并存在一个地区的集团生活中。这种融合或暂时并存的情形都相当明显地表现在这本汇集了数百年来（自辽代到清代）各民族所遗留文化足迹的记载里。这不但对于汉族近世北方民风习尚的形成和状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就是对于一般不同民族间民俗乃至整个文化的混合、演变过程规律的探究，也提供了很有益的事实例证。

再次，这本书新的资料，有力地说明风俗现象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自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以后，人类社会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的传统和根据共同语言、地域及文化上所表现的心理素质等原因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和继续，所以它在关及广大民众的生活、思想、感情的风俗习尚上相当长时间地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自然，它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也有差异、演变和变革。但却不能否认它的这种相对稳定的共同性。但是，在长期对立的阶级社会里，各种文化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自然，由于各种外在原因和各种文化自身的特点，这种烙印有时是很直接的、显赫的，但有时是比较间接的、隐微的。尽管如此，任何一种类型的生活文化现象，在阶级社会里，要不带一点这种烙印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民族里，风俗习尚，是一种与人民各方面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文化现象，在性质上它既是民族的，又是阶级的。北京是长期各民族聚居和相互混合的城市，又是历代地主最高统治者及其成员居住的城市（当然同时它也是被统治的中下层人民所聚居的城市）。在具有这样社会历史情形的地方，那两种性质（民族性与阶级性）都表现得很清楚。关于前者，中国北方广大农民的风俗也以同样或大致相似的形式在这里出现，例如填仓、龙抬头之类。关于后者，最明显的如好些仪式、习尚，是在上层阶级中产生和流行的，跟普通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也有些风俗差不多是上下共同奉行的，但是，由于资产的贫富、身分地位高下的原因，即便是同一风习，具体作法也显然不同，它象镜子一样，反映出他们截然不同的各自的社会阶级地位。在这方面，这本书里的记录（特别是后者对比的记录），是具有重要的阶级社会文化史料价值的。

这部类书式的风俗学资料书，它所具有的特点和优点，如果我们要仔细往下探求，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我想仅就上述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并不寻常了。

象这样一部书，在学术界和一般社会上不会是没有相当用处的。现在我们试简略举述几点：

（一）对于研究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近世文史）具有参考作用。

我国历史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数量巨大的史料，由于它本身存在着种种情形，它的应用价值并不一致。总的说来，其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关于过去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为社会的脊梁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文化和思想、感情的史料记述得太少（从那些著作者的出身、经历和当时

学术气候等方面看，这种情形，并不是怎样不自然的事）。即使是记述民族风俗、习尚的书，也往往偏重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例如陈元靓所编纂的《岁时广记》那样分量不少的书（四十卷），所记述的风俗行事，就有不少并非那时一般老百姓所共同奉行的。从文献上看，我们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能说太少，但真正属于广大人民所共有的（换一句话说，够得上称为“民族的”），实在也不太多。从这点看，李家瑞先生四十多年前所编纂的这部书，就一个地方的风俗习尚能搜集到这样丰盛的记载是很不容易的（这当然有客观的原因，即关于北京的文字记录本身就比较丰富）。大家知道，风俗习尚，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撰写一部比较名实相符的民族文化史（或北京文化史），没有这个部门的叙述，至少是不完整的，是一个“缺典”。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正确判断这部书对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和著作所具有的意义了。

（二）具有对于建立和推进民俗科学的作用。

民俗科学(风俗科学)是比较年轻的学问，也是富有生命力的学问。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决不能忽视或轻视这个科学领域。前几年，我国社会科学院把民俗学和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同列入全国研究科目的规划中，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门学科，从体系上说，除了关于它的原理研究和历史的整理、记述之外，还应该包含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和叙述，以及方法论的探讨等方面。这种学问不但具有一般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它还具有比较广泛和复杂的科学领域。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都有这方面的研究，以及有关的实物收集、整理和展览等活动。从学问本身的研究领域说，也大大地扩展了。我们是这方面资料极富有的国家，而且有明显地保留着那些比较原始状态和发展、递变痕迹的可贵史料。但是，我们在这门学问的研究上，不仅起步较迟，中间还走过一段曲折道路。现在正在乘强劲东风，加倍奋勇前进。对于这项工作，这部书所能贡献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有助风俗史的探索和记述；其次，它有利于我们这方面的一般原理研究；再次，对于这方面资料学的探讨、研究，也不是无所裨益的。总之，它在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整个民俗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决不是一部等闲之书。

（三）具有对于风俗改革工作的协助作用。

现代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前世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社会形态，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国内各民主阶级（特别是工农阶级）的共同奋斗，终于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崭新的新中国。三十多年来，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现在全国上下正在为建成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的伟大目标而并力前进。这是一个激烈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从经济、政治、法律、家庭的各种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风俗、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起着变动。这种变动，象海洋里的水，从海底直波动到海面，既广阔而又深湛。风俗、习尚，不仅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包括所举说的婚丧礼俗、岁时行事等），而且普遍存在于社会所有现象的各部门。生产方面有风俗，法律方面也有风俗，伦理、宗教方面同样有风俗、习尚。象这样的社会文化事物，在我们社会历史性大变动的旋涡中，怎么能安然不动呢？单就我个人在北京居住的一点经验来看，也可以明了我们当代社会风俗变化的急剧。随便举点小例子，如中元节北海的放荷花灯，中秋节的卖兔儿爷象，或一年一度的厂甸春市，……这些风俗在刚解放时还存在，现在已经属于历史博物馆的事物，或属于历史上的记载。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大都已经不知道它了。至于随着社会变动新产生的风俗、习尚，那就更多了。总之，在这个世纪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北京一隅，在风俗习尚方面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么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变化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风俗的急剧变化是自然的。但是，自然的变化（包括新生的东西），大多数可能是合理的，有些可能不一定合理。为了有计划地有根据地改变广大人民的风俗习尚，除了根据我们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外，我们还要依靠风俗科学的理论知识及历史知识，必须对实际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否则，鲁莽从事，未必能收到应有效果，甚至会产生意外的不利。在这种意义上，系《北平风俗类征》一类内容丰富的资料书（尽管它的采集地仅限于一隅），无疑是能提供有益的助力的，因为在这些风俗资料里，体现着某些风俗变革的规律，和使变革有利于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例证。这正是这部书的刊行有裨于现实生活和文化建设的一点。

上述三点，是这部书比较重要的科学的和现实的作用。此外，当然还有其它种种作用，如对于来北京的外国观光者（特别是其中的学者们）提供一定的地方风俗、历史知识；又如对于国内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史地学者在内），它也是一部有益处和有趣味的书。关于这方面的话，我就不再一一絮说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象不少有价值、有用处的著作一样，《北平风俗类征》跟它的优点、长处一道存在着，但其中也不免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李家瑞先生这部编纂和出版在四十多年前的资料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由于编纂者的世界观（包括他的学术观）和专业才识等的限制，他这部著述，在分类、选材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同样使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缺少一篇运用本门学科知识（我们姑且不对他要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所辑的大量、庞杂的（同时也是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综合，写成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导言”。这种工作是学术界的读者所希望，也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资料书的编著者所应该给予的（他是过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该书也是以这学术机关的名义出版的），同时这部书里丰富的材料是能够提供这种探讨便利的。但是，编著者却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后来人。我们在郑重指出这不足之处的同时，也希望同志们能够在接受、消化他的文献之余，立志为他填补这种学术上的缺陷（写出关于它的有正确观点和科学分析的评论文章），或进一步自己编著出更为圆满的同类的书来！

最后，我想对热心重刊这类风俗、史地资料书的北京出版社说几句话。该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已陆续出版过《长安客话》（明代蒋一葵著）、《帝京岁时纪胜》（清代潘荣陛著）及《清代北京竹枝词》（孔尚任等著）。近年来又重刊了《帝京景物略》（明代刘侗等著），现在又要重刊这部现代人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做为一个北京地区的出版社，这种书物的刊行，固然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有相当关系，但是，他们肯于再三印行这类书，也正说明他们在出版计划上是比较有远见的。它对于今天正在广泛展开的民俗科学活动（包括搜集、研究、展览和出版等），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多年从事过这种学问的人，是一种及时的恩物。不消说，是应该表示欢迎和感谢的。今后，在出版方面，希望他们能再接再厉，更多地提供同类的书物。它对我国学术文化的提高决不是无关重要的。在这里，我表示一点虔诚的心愿。

1983年11月27日

于北京西郊

·黄　羽·

参观宋庆龄同志
故　　居

宋庆龄同志光荣伟大的一生

青青的垂柳，阵阵微风轻拂着水面。北京初夏的一天，我来到了德胜门附近的后海，宋庆龄同志故居就坐落在湖的北岸。朱漆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这是书法家舒同的手笔。

进入大门，是一个面积大约有25亩的园林式庭院，花木繁茂，湖水环绕，假山重叠，亭台掩映，幽雅宁静。接待的同志告诉我，这里原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王府的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计划在北京给宋庆龄同志修建一座住宅，宋庆龄同志考虑到国家百废待兴，一再辞谢，后来，周恩来同志亲自做工作，征得了宋庆龄同志的同意，选定了这里。充分利用原有的建筑改建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幽静、安适的庭院，里面只增建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同园内原有建筑连成一体，十分协调。宋庆龄同志从一九六三年搬来，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她在这里与世长辞了。宋庆龄同志逝世后，国务院将宋庆龄同志故居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一共有三个展览厅。第一厅就是原来的大会客厅。这一部分介绍了宋庆龄同志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以及她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和为实现孙中山遗志而奋斗的情况。

这里展出了宋庆龄学生时代的照片和她

父母、姐妹的照片。宋庆龄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十五岁到美国佐治亚州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学习。宋庆龄勤奋好学，关心国事。她曾经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她把清王朝的龙旗扔在地上，挥舞着五色旗，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一九一三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国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了革命生涯。

展览厅里，展出了宋庆龄和孙中山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的照片、结婚誓约书，宋庆龄母亲送的结婚礼物：一幅“百子图”缎绣被面和四件咖啡具。

在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孙中山常戴的礼帽，袖珍望远镜、手杖，还有一支左轮和一支白郎宁手枪。

在展览厅里，我还看到了宋庆龄和孙中山在永丰舰甲板上的照片、在飞机前的合影、在虎门炮台大炮旁的留影。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形势紧急。宋庆龄从革命利益着眼，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让孙中山先行撤离，恳切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自己留下来，经过九死一生，才脱离险境。那幅在飞机前合影照片的上方，有宋庆龄的签名和英文说明。这是孙中山积极发展革命武装，着手建立空军时，我国自己装配的第一架飞机。试飞的时候，宋庆龄勇敢地和驾驶员一起飞上天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罗莎蒙”号，宋庆龄小时候的名字就叫罗莎琳德·宋。

这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是宋庆龄同志献身革命和漫长的岁月里坚强不屈、英勇战斗的历史见证。宋庆龄同志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也是中山先生理想和事业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她坚决拥护和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以后，革命遭到挫折，宋庆龄同志始终站在进步势力一边，发表声明、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行为，公开和他们决裂。面对反动派的威胁，她严正指出，“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在白色恐怖中，宋庆龄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展览厅里，我们可以看到被营救出狱的邓中夏、罗登贤、陈庚、廖承志、许德珩、丁玲以及有名的“七君子”的照片。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同志发起，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从各方面支援抗战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一个大陈列橱窗里，有一台x光机，还有无影灯、显微镜、药品等，这是宋庆龄同志一九四〇年初募集、购置的，当时她把这台x光机和许多医疗器械，想方设法送到延安中央医院。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宋庆龄和我们党一些领导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任和热爱，在展览厅的墙上，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宋庆龄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写的。

展览的第二部分介绍了宋庆龄同志解放后参加国家领导工作和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等方面的贡献。

在第二展厅的正中安放着宋庆龄的一尊汉白玉半身雕像，端庄文静，却显出坚强刚毅。

展览厅里，陈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全国解放前夕，邀请宋庆龄同志到北京共商建设新中国大计的信件，还有宋庆龄同志在邓颖超等同志陪同下，欣然北上的照片。

宋庆龄同志热爱儿童，她为新中国儿童的健康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在展览中，专门辟了一个儿童厅，介绍了宋庆龄对少年儿童的热情关怀。直到宋庆龄逝世前夕，她还向庆祝六一报告会发出贺信，信上写着：“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

走出儿童厅，我进入北楼。楼下是宋庆龄同志的小客厅、小餐厅和治疗室。小客厅的墙

上有两幅照片，一幅是孙中山，一幅是毛泽东，这是宋庆龄同志亲自选定的。在这里她曾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共商国事，还在这里会见外宾。

客厅的旁边是小餐厅，是宋庆龄同志日常进餐的地方，抬头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病中的周恩来同志的画像，是宋庆龄同志特意让挂在那里的。

楼上的一间大屋子是宋庆龄同志的卧室兼办公室，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宋庆龄同志经常在这里批阅文件、回复函电。无论写文章或题词，她都亲自动手。桌子中间放着一本印有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红字的信笺，信笺上摆着一副眼镜，旁边还放着一个放大镜。仿佛她刚才还在这里聚精会神的工作。西面靠墙是一张大床，床头柜的玻璃板下，放着孙中山的手书“共进大同”。

工作之余，宋庆龄同志喜欢弹琴，屋子里就摆着她用了多年的钢琴。

卧室旁边是书房，收藏书刊近三千册，这只是她一生中藏书的小部分。一张小方桌上还摆着一台英文打字机，也是宋庆龄同志生前经常使用的。许多文章和信件，都是她自己用这台打字机打出的。

走出北楼，漫步在小花园里。眼前的景物处处使我想到这位伟人。她爱鲜花，这里有盛开的月季、火红的美人蕉，还有她喜欢的石榴盆景。她爱鸽子，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她常常去鸽子房喂鸽子。泛着微波的南湖，她把从这里打到的鱼，送给病中的周总理。院内有枝叶青翠的果树，她把收获的石榴、葡萄分送给战友、工作人员……

“国之瑰宝”宋庆龄是一位历史伟人，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而她又是那样谦虚宽厚，那样关心同志。正象一位诗人所赞颂的：“她是伟大的，却无比谦虚。她是倔强的，却无比温存。”

宋庆龄同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又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她的事业和她的英名，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摄影：李　刚

刘半农买书

·李余·

琉璃厂古文化街的修复，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但是，要想完全了解老北京琉璃厂的风貌，也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比如旧书店便难以真正的恢复了，现在主要还是经营新印的古籍。再如过去北京过春节，文化人都喜欢逛琉璃厂厂甸的旧书摊，现在也只能从当时文人留下的笔记里来领略一二。

现代作家的笔下也曾留下了一些有关的记载，比如鲁迅先生的日记里便有不少逛厂甸旧书摊的记载。此外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散文里也有，都已是消失了的旧梦，凭后人想象而已。小说《何典》，鲁迅、钱玄同搜寻多年不可得，一九二六年的春节，刘半农竟在厂甸的旧书摊上买到了。这使鲁迅先生非常高兴，连忙为刘半农标点的《何典》写了序言。

文人们为什么这样喜欢逛旧书摊？有人说设摊出售的旧书多是店里平时不易上架的零本残册，愈是冷僻，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些珍本秘籍。琉璃厂旧书肆的风气还有送书上门的，其中也有走街串巷的书贩。他们清晨先往崇文门外的晓市去搜罗旧书，回来后往城内城外教授学者们的家里去送书。可惜个中细节我们很少看到文字记载，无从了解旧京文化风俗之一例。近日偶读刘半农的后人刘曼湖写的一篇散文《父亲》（见一九四四年《天地》第十九期），其中写到了琉璃厂的旧书商人送书上门的情形，可以让我们认识以往的风气，是很生动的。现摘引一段如下：



插图：李鸿飞

“过年时有一桩事最令父亲不高兴，那便是那些坐在门房中等着的债主，他们既非来自油盐米面的吃食铺，也不是裁缝师父来索要工资，这些债主原来全是琉璃厂旧书铺的先生们，平日每到星期日一清早父亲尚未起床，他们可已在门房中排排坐起，直等父亲叫他们进来，他们才按着秩序背着大包袱走进来，大包袱中的东西便是父亲嗜爱物之一——古书。父亲虽自知非富人，但因嗜爱便不时留下一二本，谁知积到年底其价值也就颇可惊人了，幸而父亲代书店常介绍买卖，因此情面是有的，只还一部分也就过去了，但父亲每到过年时仍是很怕那些书铺先生们的来临。”

我在琉璃厂碰到过几位老店员，他们说解放前便是“背包袱”出身。现在总算明白了他们日常出入于宅门的情形。当年旧京的教授们买旧书的气派也够大的，竟要书贩们在门旁排队坐等。可是他们的家属又道出怕见债主的实情，这当然也是很真实的。



王瑶卿说玉

·余时·

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为戏曲艺术大师王瑶卿举行了百年诞辰纪念会。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曾拜他为师，所以早年旧京梨园界誉他为“花部首席”、“通天教主”。他通文墨，擅绘画，也懂音韵。室名“古瑁轩”，又说明他是喜欢玉石的。一九二六年他撰写了一部《古瑁轩说玉》。一个戏曲演员的戏外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王瑶卿的爱好足以反映出清末民初某些名演员的生活习尚。

王瑶卿很早就成名了，在清宫为皇室唱过戏，称为“内廷供奉”。这说明他有条件搜集玉石。生活在北京文化古都，文人和名伶热衷于搜集一点小古董，在当年是很普遍的风气。何况王瑶卿本身文化水平较高，又雅爱艺文。

《古瑁轩说玉》篇幅不大，前面有一篇作者的“自叙”：

“余自幼嗜玉成癖。古玉一物，近时之人均喜玩弄，收藏者日见其多，然知者稀，辨者寥，虽有《博古图考》、《古玉图考》诸书，皆不能认定为凭据。古玉入土之深浅，出土之迟早，不可以时代计，安知三代之玉不早出土，而唐宋之玉不久入土耶？当分别有清以规之也。大凡古董一道，不可无凭据，又不可执定凭据。一物到手或真或假，变态万端，泥成说者非，狃成见者非，离成说而毫无成见者更非；心灵眼亮，失之者鲜。余研究古玉二十余年，自己所藏有一百余件，朋友处所见不下千件，经眼一看，真伪立辨，迄今未能自信而自觉稍有心系。丙寅春，病愈在家静养，就余所知者并参考诸书信笔写之，不过聊以自娱耳。”

据“自叙”推算，他在二十岁左右已经开始搜集玉石了。那时他在福寿班唱主角，又担任过小长春科班的名誉社长。少年得意，收入极丰，把钱就用在买玉石上了。那时琉璃厂的古玩商店很多，还有专跑宅门的古玩商人，王瑶卿的收藏想来得自他们的手中。

《古瑁轩说玉》共分十三题：玉之出产、玉之名目、玉之本色、玉之受色、说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